

# 诗意之议：百年新诗教育的若干矛盾说略

高若栋<sup>1</sup>

(1.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中国 香港 999077)

**摘要:** 饱受师范与文学双重领域关注的新诗教育问题, 既是脱胎于古典汉语文学与美学道统的衍生产物, 具备明显的书斋风范、私塾气质, 长期作为一种传统语文或诗词教育的支流、附属品而存在; 同时在愈发丰赡的文化理论与学术视角下, 新诗教育又堪称一面跨学科、跨时代的多维度的价值舆图。汉语新诗迄今百年, 其本质正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发生剧变和改革的碑铭。长期反映乃至介入、参与建构几代人的精神“启蒙”、思辨与审美。深入研究当代新诗教育所存在的矛盾与弊症, 所开拓的创见与新思, 或将形成一章有利于学科建设与施教发展的经验图谱。

**关键词:** 新诗教育; 诗歌文化; 当代文学; 转型与矛盾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4.112

## Poetic discussion: some contradictions in the hundred years' New Poetry

### Education

Gao Ruodong<sup>1</sup>

<sup>1</sup>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issue of new poetry education, which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both the normal and literary fields, is not only a derivative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 orthodoxy, but also has obvious style of study and style of private school. It has long existed as a tributary and access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r poetry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increasingly rich cultural theory and academic perspective, the new poetry educ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cross era and multi-dimensional value map. The essence of Chinese new poetry is the inscription of the dramatic change and reform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Long term reflection, even interven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speculation and aesthetic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sadvantages existing in contemporary new poetry education, and the innovations and new ideas developed may form a chapter of experience map conducive to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poetry education; Poetry cultur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ransformation and contradiction

**作者简介:** 高若栋 (2003—), 男,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社科前沿》及 Multidimensional Culture & Arts 编委、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 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化生态研究。

## 一、阵痛或永痛：诗学价值的缝合

解构新诗教育的概念，其本质乃是对新诗文学和现代教育的双重探索，甚至包括对诸如社会或政治等跨学科的第三领域内容展开联合勘探。惟有如此多维度的研究视阈和设计范畴，方能在复杂或复合的涌动信息中归因、溯源，从筚路蓝缕的演进历程中尝试总结经验，面对若干矛盾和创见，推动有效地纠偏与展望。纵观发展史，新诗教育这一概念从较为浅显粗略的学术思考，转变为一种具体落地的融入主干学科的授学项目，最早能锁定在1930年代前后，彼时基于以胡适、蒋光慈、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初代白话诗人的作品和较为粗糙的理论模型，基本形成了新诗教育与传播的框架，在相对精英化的社会中少数人群内流通，教育的主要案例发生在脱产的象牙塔内，客观上为后续多年间新诗教育与“知识分子化写作”或“学院写作”概念产生稠密关系奠定了历史渊源。历经“新文化运动”后的文化环境可谓地覆天翻，汉语新诗在诞生之初就附着强烈的域外色彩，其代表文本与相关文化论章都彰显了与古典中国的诗词文学道统的“脱钩”行为。而这种新与旧之间的割裂之感，在彼时的文坛尚无太多学者注重修复或重探；至于教育领域，则更是在“既成事实”中几乎不加辩驳和探析地展开模糊的普及和授课运动。

事实上，在更宏观的历史层面审视近现代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发展历程，始自19世纪中期便已经具备了从旧至新的“大变革”的前兆和部分人文环境，而中国的教育学近代化思想也基本起步于这一阶段。少数留洋海外的官僚知识分子或具备资产阶级革命倾向的学人，成为了鸦片战争国门洞开之后，接触西洋思潮乃至学习其价值体系，深入考虑中国之文化命运的先驱。倘若按照如此状态顺遂发展，在1850年代中国理应诞生出较为成规模的新式学堂，引入西洋人文思想，从而在后续十余年间培养出本土文化人才，策动包括诗歌在内的诸文学领域的改革。但现实却远非如此，中国在整个1842至1862年间，在教育的发展上几乎是没有任何作为的<sup>[1]</sup>，其中原因诸多，主要还是源于根深蒂固的自上而下的封建集权社会结构，以及自下而上的传统教条包裹的保守化本土文化思想壁垒。由此几乎可以得出结论，在基础军事运动尚未掀翻现行政治状态之前，在革命政治势力尚未对腐朽而庞大的社会文化心理产生冲击之前，单纯期待文化与教育领域的改革先行，并以此试图引发对古典中国的改造和革新，乃是或见涟漪但波涛不兴的镜花水月。

因此直至1910年代，即便历经了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皇族内阁等政治事件，甚至是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波及大半个中国社会的历史事变之后，中国的诗歌教育仍然基本保持着一种传袭自古典时代的理论体系、思辨价值观和教育模式，在对诗的处置、学习的方法论上，以曾国藩所谓“先之以高声朗读，以

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sup>[2]</sup>的方式高度类似，这种教育行为习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蔓延到了1949年后，成为多数对汉语新诗不加了解的社会大众对诗歌教育所秉持的固有印象。而在诗的主体、内容的问题上，迄止1920年代，伴随具备浓厚政治色彩和体制革命倾向的“五四运动”为燃点，汉语新诗才终于以诸如《新青年》等革命性文化杂志为桥头堡，正式实现了初代文本及理论的诞生，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充其影响。杜鹏所谓“当新诗作为一种知识进入教育场域并被传播和推广的同时，具有现代意义的审美方式也随即得到传播和推广”<sup>[3]</sup>的判断，确切反映了汉语新诗与现代教育之间相辅相成或堪为先导的关系。然而繁冗密布的问题和矛盾，自汉语新诗发轫起便紧随其身，学界内的争论甚至蔑视，文人士林之间的犹疑或过分激进，诸如此的情况屡见不鲜，究其根本主要是围绕新诗话语的革命价值，所附着的极容易被解读为暴力性的特质。整个民国时代几乎都充斥着旧文化、旧道德及其价值体系与新文化、新思想及其自有主张之间的对垒和互搏，汉语新诗长期作为文学领域的一个显著代表存在。关于文本语言的根本性改变，几乎挖空或置换了千百年以来古典汉语诗歌的基因，从风雅颂到乐府，从宫体诗到格律诗词，某种文字模式上的传承感在汉语新诗的纸面几乎踏空，无论是对韵律的要求、可读性的讲究，或是描写物象及书写精神，都存在着较大的偏差或位移。而关于诗学思想上的转向，则更为受到批判和质疑。汉语新诗以域外经典的引入作为发展基准点之一，客观上大量吸纳以欧美为主体的哲学、美学思想系统。存在一定“崇洋”特征的新诗写作群体容易造成一种可悲的偏见，继而是对中国本位传统的背弃或下放，甚至是面朝历史文脉的践踏。

在《谈新诗》中，胡适曾列举过中国诗史上四次诗体大解放，即“由《三百篇》的‘风谣体’到南方的骚赋体，这是第一次解放；由骚赋体到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这是第二次解放；由五七言诗变为句法参差的词，这是第三次解放；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sup>[4]</sup>诚如其所言，在四次“解放运动”之中，能够明显窥出前三次的变化相对平顺，时间周期偏长，几乎都消耗数百年乃至千年。同时，变革后的诗歌无论体式抑或是思想系统，对变革前的诸种内容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继承、传袭特征。惟第四次“解放”之变革烈度、跨越程度几乎是空前的，并且耗时之短、转变之剧烈也难以从历史中获取更多前例经验，这或许是近代中国社会全方位所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处细节体现。结合时代整体环境，新诗及其教育问题所折射出的崎岖与试错之旅，便相对易于解读了。

欧美及日本的近现代诗学理论、文艺思想与变革

历程,曾为中国提供了相当丰富和多元的外来经验,以及与之伴随的风险和错谬。结合于此,迄止1940年代,汉语新诗及教育问题迈过二十年艰难发展阶段,终于初步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且勉强自持的体系。由于汉语新诗与古典中国传统诗学价值系统的相对脱钩,为了在短期内建立起一套新式而独立的诗学结构,不得不大量取法于域外,其中包含诗歌教育在内的诸多环节内容,以此尝试解决文学生态所存在的价值矛盾和逻辑空窗。曾经与中国在“教育现代化曾处于同一起跑线”[5]的日本,在近现代诗歌文学转型发展问题上,却领先于中国至少一个时代周期。由于“黑川开关”之后幕府统治的逐步崩溃,日本文坛在整体政治与文化环境的变更之下,迅速拥抱以欧美为主体的理论轴心,结合过去数百年间治理“汉学”与“兰学”的经验,在扭转了江户时代以前“学校教育衰落,武士阶层只能在家庭中和寺院里受教育,平民百姓则享受不到有组织的教育”[6]的情态之后,在1868—1926年之间,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社会文化氛围相对宽松,加之文艺教育的蓬勃和对外视野的开放,日本诗坛得以孕生出以岛崎藤村、秋原朔太郎、石川啄木、北村透骨等为代表的诸多诗坛名家,客观上为后续高桥未衣、横山伸子、藤本洋子、堀场清子等1920—1935年间诞生的更为年轻的一批诗人铺垫了写作生态和提供了经验范本。至于以高桥睦郎、谷川俊太郎为代表的1940年代及其后的诗学大家,则更是日本新诗历经变革阵痛和初步发展阶段后的重要受惠群体。中国的新诗发展与教育系统几乎在1930—1950年之间出现了类似的状况。以闻一多、李金发、徐志摩、穆木天等为代表的先驱诗人依托各自的理论雏形和思维判断,或尝试连接传统文脉,开拓以“新格律”为名的流派探索;或不断效法于西方“现代派”的衣钵,开展汉语的“解放”步骤。

相较于日本之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相似性,欧美为主导的诗学文化对汉语新诗百年发展的影响力几乎无可替代,浩大的“启蒙”思潮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在汉语新诗的两大黄金时代占据了重要作用,从“新文化运动”到“新诗潮”时期,从梁启超时代“新民”[7]启蒙阶段,到李泽厚所谓“再度启蒙”[8]的呼声,其中浪潮无一不与欧美文艺达成紧密关联。前者时代,从知识体系到授课机制、伦理规范到价值意识都大批接收域外的经验和文本态度,在1950年代之后台湾地区以周梦蝶、洛夫、余光中等为代表的诗人开始反思中国古典文化道统与新诗衔接或复振问题之前,基本上欧风美雨稳定占据以学院为主场的汉语新诗研究、创作与教学的份额。诚如许子东所言,西方现代主义文艺及文化思潮对中国大陆的渗入和影响呈现出两个主要形态,即“一方面表现为一连串热闹起伏的文艺论争,另一方面则诱发了一种静悄悄踪迹难辨的文学技巧”[9],即便是1958年前后大陆地区诗坛,对于西方文艺思潮的理论研讨和潜移默化的技巧学习,仍然是频繁发生

有迹可循的,即便多数明面上的效法对象逐步狭窄或受控制化,从广泛的西方内容,变更为针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范畴内的文艺作品及理论。彼时汉语新诗的教育体系也呈现具有苏俄化、东欧化色彩的外来系统与本土惯有的诗词文学教育系统并存或互涉的状态,普希金、叶赛宁、李白、杜甫可以供存在一本教材中,甚至还包括诸如毛泽东、陈毅等革命领袖的诗词作品,进入1960年代,汉语新诗的教育问题在基本结束了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小范围传递或研判之后,逐步进入了扩大社会受众和参与度的普及时代,多数的工农大众及其子弟得以在新中国的教育体系之下初步接触到汉语新诗作品及若干粗浅的理论模型,即便具体施教的方式尚不精细和优良、选材文本的内容尚不前沿和丰赡。但伴随新诗教育的客观发展,数十年前所存在的群众心理中,新诗体系与本土文化所存在的严重之不适配、新诗与古典诗词文学所存在的难以调和之冲突等问题,已被有序消弭。

## 二、狭路或歧路:教育思想的症候

教育事业的变革与迭代在汉语诗学从无到有、高速发展的20世纪上半叶,同样处于不断试错、开拓和处理诸多历史性矛盾的运动状态中。自清末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系统性的近现代转型,在1940年代完成了基本建构,民国时代高校文科专业的丰盈化、专业化发展,逐步接纳了汉语新诗,继而成为发展的温床甚至是理论创生的母港,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叙事之下,南渡北归的变迁羁旅之间,为诗学提供了一处避风之地,汉语新诗的教育融入进汉语言文学的整体脉络,开始愈发吸引、凝聚一批年轻的诗人或批评家群体,对其从热爱到逐步产生文艺认同,这与“地方认同”的概念有几分相似,即所谓个体所投入“一系列态度、价值观、想法、信仰、意义和行为倾向”[10],汉语新诗正是在如此的“认同”之中,营建起初期的信徒和拓边者。有赖于从蔡元培到李太白,从陶行知到刘伯明乃至叶圣陶,几代堪称大学旗幡的教育家所主导或参与的深化改革,迄止1950年代,在高等教育板块内汉语新诗已经相对稳定地能够占据现当代文学内容的一席之地,较为细化地产生的诸如外国诗歌、中国现代诗歌等被纳入外国文学、文学翻译、中国近现代文学等独立学科的专业知识项目。在初级教育阶段,甚至是扫盲或普及性教育阶段,汉语新诗也不再被忽视,乃至排斥在诗歌这一概念之外,即便彼时提及诗歌仍以唐诗宋词为主轴,言必称李杜苏辛。

汉语新诗的崎岖之路,其大多数时刻与现代教育的实验之路产生着路径性的呼应,在新旧教育体系的矛盾之中,自然隐藏着新旧文化、新旧诗学之间的问题。诚如程士庆所言,“诗教之所以强调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当然是出于要充分利用孩童记忆这一黄金窗口期,可以让孩子在初识自然名物时便具有诗性的眼光,潜移默化地培养情操,成长为一个自足的个体”[11]一

般,启蒙阶段几乎可以被视作诗歌教育的桥头堡,过去千百年间长期为古典诗词所占据,新诗自发轫阶段起便一直渴望获取部分席位,从幼年阶段培养孩子的诗性理解、价值版图和思想雏形,对于一类文学形式和文化系统的发展是百年大计。新中国建立之后教育改革与文化领域现代化进程持续推动,抵达20世纪后半叶,虽然多数课堂上仍然以所谓“灌输和填鸭式”的僵化教学方式,即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艺术特色的四段论教学方式”[12]开展新诗教育,但汉语新诗确已保障了其在教育环节内的份额,加之1960年代后地下阅读与写作运动的开展,客观上为改革开放后汉语新诗的高速发展时代,奠定了大量阅读受众和社会参与度的基础。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与探索,对于汉语新诗学术地位的争辩、学科价值的批驳和发展趋势的臆测,已经不再是为人所关注的重点,新诗在创作与理论建构层面、不同级别的教育层面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文艺姿态和文化心理,成为了1978年之后值得广泛思考的影响莫大的问题。当跨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时期”所笼罩的文艺阴霾和政治风云之后,从手抄本与“禁书”时期成长而出的一代文学青年开始放出新声,这是绝不同于艾青、何其芳、闻捷、公刘、牛汉等诗坛宿将已然趋于老迈、固化和带有沉淀意味的腔调,以北岛、芒克、舒婷、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中青年笔端,通过强烈的呐喊和质疑、叩问与谛听面朝浩荡的历史与迷茫的当下社会爆发既出自个人情绪又具备群像代表价值的文字,在“今天派”为主体的写作集群作品频发,在大众社会 and 文林学界产生普遍反响的时刻,章明等老批评家所谓“气闷的朦胧”[13]的驳斥言论很容易便被时代的浪潮所淹没。一种全新的文艺姿态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体制变革的中国土壤上愈发滋长,并且1980年代中后期的诗坛,伴随诸如“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整体主义”等“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新态势接踵发生,更为多元丰盈的局面造就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诸多主张各异的写作群体、理论派系共同组建了百舸争流的汉语新诗图景,其中的思想风险与文化收益共存且高涨。对此时期,谢冕曾谈到,“新诗潮的最大贡献在于引进意象表现等现代手法,造成了诗意的朦胧,从而在新诗的艺术领域展开了一场美学变革,而后来的挑战再一次瞄准了这一要害,他们向意象造成的罗列和雕琢,以及艺术的贵族倾向发难……当诗变成人人都可为所欲为的时候,诗歌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14],汉语新诗在此之前的阶段似乎从未出现过如此之多的“挑战者”或“异见人士”,当“今天派”将老一批官员诗人或成名宿将推向岁月故纸堆之后不满十年间,“第三代”的更为年轻的诗人则操持理论的武器,配合笔端的新文本态势,力图将“今天派”诸君拉下神坛。而“第三代”内部诸多流派和风格群体之间的互相攻讦、讨伐、批判与攀附亦是多如牛毛,或有对本土传统文脉产生

颠覆性思想,或有对权威解构,主张一切回归于世俗生活的语言,对修辞等艺术手段嫉之如仇。若干作品走上了“使熟悉的语言给人以陌生的感觉”[15]的境地,而另一部分则大有通俗到底的精神,将一切隐喻、婉约、精雕或虚浮的内容解绑、拆散,直到近乎日常口语的地步。

文化心理作为更深邃的另一项问题,从“新诗潮”阶段几乎蔓延至今,长期作为诗学理论、新诗教育和诗歌创作等诸领域无可回避的议论重镇。同时该问题也可被视作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心理与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旁证,诗歌往往具备映射时代、折射人心的效用,尤其针对于暗角、深井等不易觉察的细微之处。张枣在1990年代谈及“元诗(metapoetry)”概念,彼时“知识分子写作”概念已然崛起,诸如欧阳江河、臧棣、孙文波、西川、王家新等诗人已成为引领纸面潮流的成员。纵览当下活跃于话语诗坛的大多数名家,几乎都亲历甚至深度参与过这一阶段的诗坛论战,他们在青年时代即开始反思诗学的现状和身世,对汉语新诗数十年的发展之旅展开系统性的质疑和反省,并基于此展望未来诗学的可能性。在诸多矛盾与未知、经验与反经验之间,文化心理转变的波幅,呈现出聚焦于诗歌理论细节和立足于整体新诗脉络的两个分镜。关于前者,所谓“元诗里的反思必然趋向理性与抽象,元诗的语言也相应地趋向于工具性的表征,这一切皆与诗背道而驰,使元诗面临内在的自我消解的危机”[16]的论述堪称代表,张枣对于汉语新的探索已超出了彼时整体环境,从公共现实到私人情感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关联性写作之外,他所注重的“从诗到诗”的方式,以某种旁的路径的概念成为丰赡乃至突破理论框架的尝试。而关于后者,更为宏大且触及汉语新诗底层逻辑建筑的问题,被世纪之交的诗人们愈发提及、重视,正如2001年10月于坚在书信中曾对陈超谈起的“不是由西方诗歌建立起来的”[17]一般,在度过了新诗发轫阶段的理论与文本双向空无、早期取法欧美营建基本新诗系统、政治挂帅的写作突破与紊乱等阶段之后,诗人与批评家们普遍开始重谈“标准”的定义,汉语新诗这一看似孪生于欧风美雨经验之下的文学形式,是否到了构建自身独立性,开展与本土传统文脉对接或复归的契机。时代发展的主流,所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新诗教育这一领域再度迎来了新的转折,即如何实现汉语古典诗学教育和新诗教育的融合、互涉与整体性发展和施教。

新诗教育基本呈现出滞后于新诗写作与理论前沿一代人左右的状态,具体换算到时间轴上,大概维持在10—20年甚至更长时间。在高等教育板块,邓小南围绕改革开放后四十年中国人文学科发展及构建“自主学术话语体系”曾展开探讨,所谓“但目前的学科体制,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文学科的根本性义务,使得学术某种程度上重心不在学而在术”[18]的问题,一针见血

地扼住了新诗教育的弊病所在,自1980年代以来高校关于新诗的教育多数偏重于按照编年史系统的事件流水账记录,或若干重要人物的脸谱化、扁平化灌输,并且在这类诗学的“岁月史书”中还存在相当规模的空隙或漏洞,对于数十年前的新诗文本选用、解构以及重点诗人的分析和剖解,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粗疏。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迄止2010年代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为新时期诗歌所设置的两章内容里“对于北岛这一最为重要的朦胧诗人,依然采取避而不谈的策略”[19],受非文学性规制要求的结果,或刻板化、僵化的文学教育方法论所造成的结果,即是在谈及“新诗潮”这一汉语新诗黄金时代之际,竟忽视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在如此的教材影响之下,对于汉语新诗在具体诗艺的“术”和理论思维的“术”的忽视,也就容易解析了。

直至近十余年来,伴随诸如创意写作等专业的普及及开设,以及新诗研究专项机构的陆续设置,汉语新诗的教育与诗坛前沿生态之间的距离终于在逐步缩减,同时施教手段的多样性和教育思想的扩散与拓展,成为另一层的助力。诸如“在诗歌教育中,少一些理论,多一些创作;少一些概念,多一些作品;少一些学术论文,多一些细读批评;少一些美学,多一些美的示例”[20]的呼吁近些年不断发生,一行在《论诗教》中便曾有过如此阐述。而这一观点在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指导或参考意义,相较于陆续丰赡和高度专业化的高校,更为切中实际效果。长期深耕基层诗歌教育问题的吴昊,曾对廊坊市某初中的三个年级共150名学生进行过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喜欢并且愿意了解新诗深刻内涵的学生占49.01%,对新诗没什么感觉的学生占41.72%,不喜欢新诗的学生占9.27%”[21],数据中显示过半的学生并不存在对新诗了解和学习的欲望,所反映而出的客观现实是由于教育环节或方式的弊病,导致新诗距离大量的年轻人愈来愈远,逐步成为束之高阁的事物,大有退化或缩减为精英群体内部沟通或营设的文化产物的趋势,从而无法延续自新中国以来新诗教育不断下沉民间、普及大众的发展策略。

深究更为细节的问题,一者是中小学阶段新诗选材与内容上的缺憾,和高校早前存在的矛盾类似“迥异于传统新诗的所谓‘异质新诗’,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到语文教育界的漠视”[22],不在少数的重要作品和理论结构从纸面缺席,在教育环节和生态氛围中新诗长期处于相对弱势和边缘化的状态,学生对于汉语新诗的理解大多停留在大半个世纪前以闻一多、艾青为代表的经典作品,或极少数诸如普希金、惠特曼等百年前域外诗典的译介版本,极容易对当代汉语新诗形成基于上述的单薄印象。课外阅读板块上,能够主动选择新诗文本掺入浏览的学生群体更为稀少,在“考纲”为主旨的应试教育结构之内,大量饱含着自由色彩、个体精

神和人文探索的汉语新诗近乎以一种迥异者、外来客的形象存在,游离于学生们的认知范围之外,也被隔绝于课堂的书本之外。二者则是源自大量教育工作者对于新诗的漠视或无知,在中小学层面大量的基层教师自身对于汉语新诗的理解存在各种曲解、歧意或盲目,普遍师范院校流水式锻造出的施教群体,自身对于汉语新诗的学习程度本身就基于上述所谈及的高校教育,加之“高校新诗教学与中学新诗教学似乎是各成体系,缺少交流”[23]的现状,导致除极少数源于自身对新诗抱有兴趣或兼职从事写作事业的成员外,整体教师的群像,仍旧是匮乏之姿。汉语新诗在课堂上所面临的失位、偏移等问题,追溯其成因,部分根源就在于此。

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播层面,作为系统性教育结构之外的另一重要场域,其与象牙塔之间长期维系着联动、互补或互相戕害的联系。以作协、文联单位及下属或主管的文学杂志、理论期刊等机构为主体的新诗文化链条,在当代中国文化社会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中所产生的奖项及签约项目私相授受、文学活动及出版资质暗箱操作等问题,客观上损害着新诗教育的发展,诸如《星星》诗刊的“夏令营”、《诗刊》社所主办的“青春诗会”等,愈发沦为若干文人关系网络中衍生权利和资源接班人的“继位流程”游戏,而非对整体社会的诗学普惠。而另一层面,上述“链条”由于手握海量官方资源,在诸多政策性纲领的指引之下所开展的工作,在新诗文学作品传播、诗人活动等领域为汉语新诗扩大受众面和阅读群体、参与人群做出难以磨灭的贡献。与之同时,社会层面还存在若干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书商、出版人等组成的或独立工作或联合活动的诗学力量,多年来陆续衍生诸多民间诗歌读本、刊物以及活动奖项,奖掖者大多出自民间,身份职业各异,对于新诗文化的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效用,另有诸如王志军的《进入诗歌——关于读诗和写诗的六堂课》、廖伟棠的《我偏爱读诗的荒谬——现代诗的三十堂课》、王伟的《试论诗神》以及黄梵的《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等相对阅读门槛偏低的通俗讲解新诗类作品,在青年人为代表的非汉语新诗领域相关从业群体之间,具备较为具体的影响力,往往被视作了解新诗的敲门砖。

张桃洲曾扼要地指出,新诗教育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纳入程式化的学校教育机制、与其他学科教育无差别的新诗教育,一种是个性化的、非应试的新诗教育。后者的意义是打破环绕在新诗和教育周围的双重樊篱,将新诗教育还原为一种广义的教育,即通过各种历练、实践对个体身心进行自我完善,而读诗和写诗是其中一种灵活、便捷的方式”[24],诚如是,所谓“广义的教育”正是对社会层面的新诗教育活动极好的定义。作为诞生伊始就不断与时局政治、地缘历史、社会思潮乃至域外信息产生丰盈的交流,存在包容与

被包裹、影响与受影响等关系的文学品类,汉语新诗历时百年,从社会教育、高等教育和义务(基础)教育三个剖面进行阐释,或能够有利于学界抵近其相对真实客观的庐山面目,在文化强国的时代旗幡之下,构筑中国自主的文明与文化理论体系、文学与文论话语

语权已然成为汉语新诗必然参与,乃至亟待作出更深度贡献的事业。而作为新诗发展的基石,其教育路径将如何克服历史的、现行的甚至未来的矛盾和困境,革故鼎新,弥久发展,是值得付诸思考和寄予期盼的“终极”之问。

#### 参考文献:

- [1] 吴小玮. 前教育现代化时期的落差——以《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为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9(2): 90.
- [2] 张隆华. 中国语文教育史纲[M]. 长沙: 湖南师大出版社, 1991: 258.
- [3] 杜鹏. 重返20世纪上半叶“诗教”现场——评孙晓娅《庠序有诗音: 新诗教育研究 1919—1949》[N]. 昆山日报, 2025-07-03(003).
- [4] 徐芳. 百年新诗传统、诗歌教育与其他——吴思敬教授访谈录[J]. 文艺论坛, 2023(1): 25.
- [5] 古惠文. 从中日近代教育的比较看大国崛起[J]. 嘉应学院学报, 2007(5): 48.
- [6] 王桂. 日本教育史[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7: 84.
- [7] 田兵权, 陈国庆.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历史价值[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6): 102.
- [8] 徐碧辉. 美学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20世纪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J]. 文艺研究, 2004(2): 158.
- [9] 许子东. 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J]. 文学评论, 1989(4): 21.
- [10] 梁江川, 刘志宏.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认知对粤港澳大湾区认同的影响——文化特质的中介作用[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4, 40(10): 1567.
- [11] 程士庆. 为什么是诗歌——诗教与文学通识教育[J]. 星星·诗歌理论, 2025(6): 21.
- [12] 霍俊明, 岳志华. 展开的起点: 新诗教育问题与反思[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4): 17.
- [13] 徐国源. 批判“失语”与“朦胧”指征——中国朦胧诗派新论[J]. 当代作家评论, 2005(1): 100.
- [14] 谢冕. 一个世纪的背影——中国新诗 1977—2000[J]. 文艺争鸣, 2007(10): 59.
- [15] 罗振亚. 新诗解读方法说略[J]. 求是学刊, 2007(1): 111.
- [16] 李心释. 元诗的发生及成诗逻辑[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9): 136.
- [17] 霍俊明. 夜雨修书: 陈超和他的朋友们往来书简[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4: 243.
- [18] 邓小南. 人文学科不宜过于“科目化”——写在《中国人文学科四十年》出版之际[N]. 光明日报, 2025-10-18(012).
- [19] 易彬.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与新诗教育问题[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108.
- [20] 一行. 论诗教[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
- [21] 吴昊, 苗雪艳. 现代诗歌研究课程与廊坊市初语教学衔接研究[J]. 语文教学之友, 2024(1): 7.
- [22] 潘涌. 论语文素质教育背景下的新诗教学[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2): 98.
- [23] 吴昊, 姚灿. 高校与中学新诗教育的差异性分析及融通路径探索[J]. 江汉学术, 2024(5): 29.
- [24] 张桃洲. 新诗教育的困境及可能[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2): 138.